

乡村振兴背景下刺绣文化生态圈的重构与可持续发展路径

陈嘉浩 李文骥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刺绣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典型代表, 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记忆与地方性知识体系,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然而, 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 刺绣文化赖以生存的乡村社会生态遭受严重冲击, 传承人流失、技艺断裂、文化土壤贫瘠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为刺绣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制度机遇。本文以文化生态学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和乡村振兴理论为分析框架, 系统考察了刺绣文化生态圈在当代社会的解构与危机,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体重塑—产业再造—空间重构—制度赋能”四维一体的刺绣文化生态圈重构路径。研究发现, 刺绣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从“遗产保护”到“生态重建”的范式转换, 通过培育新型传承主体、构建全产业链体系、重塑文化空间载体、完善制度保障机制, 形成“文化—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本文结合苗绣、苏绣、蜀绣等典型案例进行案例分析, 提出了以刺绣文化生态圈的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可行性路径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刺绣文化; 文化生态圈; 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持续发展; 传承重构

[基金项目] 2024 广西壮族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现代刺绣文化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202414684021)

Re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ways of the Embroidery Cultural Eco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iahao Chen, Wenji Li

Guangxi Voc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0,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Abstract: Embroidery, as a quintessential traditional Chinese handicraft, embodies rich ethnic cultural memory and local knowledge systems, making it a vital objec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safeguarding. However, amid the process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rural social ecology on which embroidery culture depends has been severely disrupted, giving rise to increasingly acute problems such as the loss of inheritors, the rupture of transmission chains, and the depletion of its cultural soil.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esents a historic institutional opportunity for the re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mbroidery culture. Drawing on cultural ecology theory,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eor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y as analytical framework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disintegration and crisis of the embroidery cultural ecosystem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an integrated four-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embroidery cultural ecosystem, namely “subject reshaping – industry reengineering – spatial reconstruction –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mbroidery culture necessitates a paradigm shift from “heritage protection” to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By cultivating new types of inheriting subjects, constructing a whole-industry-chain system, reshaping cultural spatial carriers, and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safeguard mechanisms, a virtuous cycle of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among culture,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y can be established. Through case analyses of typical embroidery traditions

such as Miao embroidery, Su embroidery, and Shu embroidery, this paper proposes feasible pathway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leverag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mbroidery cultural ecosystem to facilitat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Embroidery Culture; Cultural Ecosyste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heritance Reconstruction

一、研究背景

刺绣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之一，历史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苏绣、湘绣、蜀绣、粤绣四大名绣以及苗绣、彝绣、壮绣、侗绣等众多民族刺绣品类，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刺绣文化谱系。据统计，在国务院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与刺绣相关的项目超过 30 项，涵盖了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的刺绣技艺^[1]。刺绣不仅是一种手工技艺，更是一种植根于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它与乡村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审美观念体系、价值信仰系统等紧密交织，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圈”。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多重冲击下，中国农村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迁。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乡村社区日益空心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被现代工业品所取代，手工劳动的经济回报急剧下降；现代审美观念的冲击使传统刺绣图案和风格遭到冷落；传承人老龄化严重，年轻一代对刺绣技艺的学习意愿持续走低^[2]。这些变化不仅导致了刺绣技艺的传承困难，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刺绣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生态基础。

2017 年，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提出“传承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培育乡村文化产业”等政策目标^[3]。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保障。在这一宏观政策背景下，刺绣文化的复兴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它不仅是非遗保护的文化使命，更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载体、乡村人才振兴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各地围绕刺绣文化与乡村振兴的结合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贵州省通过“锦绣计划”培训农村绣娘超过 50 万人次，带动近 50 万妇女就业增收^[4]；湖南省依托湘绣产业集群建设特色小镇，推动湘绣从传统手工作坊向现代文化产业转型；云南省将彝绣、白族扎染等传统手工艺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打造了一批特色文化村落^[5]。这些实践为研究刺绣文化生态圈的重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一）文化生态学理论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旨在研究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互动适应关系^[6]。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自然环境、技术条件和社会组织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文化系统具有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适应性和进化性。此后，文化生态学经过拉帕波特（Rappaport）、莫兰（Moran）等学者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学界，方李莉将文化生态学理论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提出了“文化生态保护”的概念框架。她指出，非遗不是孤立的文化碎片，而是植根于特定文化生态环境中的活态文化系统。非遗的保护不能仅仅着眼于具体技艺和产品的保存，更应着眼于其赖以生存的整体文化生态环境的维护与修复^[7]。刘魁立进一步提出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构想，主张通过划定特定区域，对区域内的非遗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8]。

将文化生态学理论应用于刺绣文化研究，可以将刺绣文化视为一个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包括：（1）技艺子系统——刺绣的技法、工具、材料、图案等技艺要素；（2）主体子系统——传承人、绣娘、学习者等人力要素；（3）社会子系统——家庭、社区、行会等社会组织要素；（4）经济子系统——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要素；（5）文化子系统——审美观念、信仰体系、节庆习俗等文化意义要素；（6）环境

子系统——自然环境、地理区位、基础设施等外部条件要素。这六个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构成了刺绣文化生态圈的基本运行机制。

（二）可持续生计理论

可持续生计理论（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SLA）最早由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旨在分析贫困群体的生计策略和发展路径^[9]。该理论提出了“生计资本五角模型”，将影响生计的核心要素归纳为五类资本：人力资本（知识、技能、健康）、自然资本（土地、水源、矿产）、物质资本（基础设施、工具设备）、金融资本（储蓄、信贷）和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合作）。可持续生计的实现取决于这五类资本的有效积累和合理配置。

将可持续生计理论应用于刺绣文化研究，可以从传承人和绣娘的生计视角出发，分析刺绣如何为乡村居民提供可持续的生计来源。具体而言：刺绣技艺构成了传承人的核心人力资本；刺绣所需的天然纤维、染料等来源于自然资本；绣架、绣针、绷架等工具属于物质资本；刺绣产品的销售收入和相关信贷支持属于金融资本；绣娘之间的技艺交流网络和师徒关系属于社会资本。当五类生计资本能够在刺绣活动中得到有效积累和再生产时，刺绣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10]。

（三）乡村振兴理论

乡村振兴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实现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振兴。贺雪峰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重建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能力，避免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输入的“输血式”发展^[11]。温铁军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指出，乡村振兴应注重乡村多功能性的开发，将生态、文化、社会等非经济功能纳入发展框架^[12]。

在文化振兴层面，学者们普遍认为，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途径。王宁指出，乡村传统手工艺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更具有维系社区认同、传递文化记忆、促进社会融合等社会文化功能，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13]。张晓琳等通过对贵州苗寨刺绣文化的田野调查，发现刺绣活动在乡村社区中发挥着凝聚妇女群体、促进代际交流、强化文化认同的重要社会功能^[14]。

（四）文献述评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第一，对刺绣技艺的历史源流、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阐释；第二，对刺绣传承面临的困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分析；第三，对刺绣产业化发展的模式和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多数研究停留在单一维度（技艺保护或产业发展）的分析，缺乏对刺绣文化作为整体生态系统的系统性考察；第二，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刺绣文化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路径关注不够充分；第三，缺乏将文化遗产、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生态保护有机统一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在以上方面有所推进。

三、刺绣文化生态圈的历史形态与当代解构

（一）传统刺绣文化生态圈的基本形态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刺绣文化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以苗族刺绣为例，其传统文化生态圈具有以下特征。

1. 主体层面：全民参与的传承格局

在传统苗族社区中，刺绣是几乎每一位女性必须掌握的生活技能。女孩从六七岁开始跟随母亲学习刺绣，到十五六岁时基本掌握主要的刺绣技法。刺绣技艺的传承以家族内部的母女相传为主，辅以社区内部的邻里互学^[15]。传承过程自然融入日常生活，无需专门的教育机构和教学安排。同时，刺绣水平被视为衡量女性能力和品德的重要标准，优秀的绣娘在社区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这种社会评价机制为刺绣学习提供了强大的内在激励。

2. 功能层面：多重文化功能的叠加

传统刺绣在社区生活中承担着多重功能。在实用功能方面，刺绣服饰是苗族人民日常穿戴和节日盛装的主要服饰来源。在审美功能方面，刺绣图案是苗族审美观念和艺术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功能方面，刺绣服饰是婚姻、丧葬、节庆等重要社会仪式的必备用品；刺绣活动本身也是妇女社交互动的重要场合。在文化传承功能方

面，刺绣图案中蕴含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内容，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16]。

3. 生产层面：自给自足的循环体系

传统刺绣的生产体系具有明显的自给自足特征。从原材料来看，刺绣所用的棉线、蚕丝主要来自自家种植和养殖，染料取自当地的植物矿物资源。从工具来看，绣针、绷架等工具由本地铁匠和木匠制作。从消费来看，刺绣产品主要用于家庭自用和社区内部的礼物交换，较少进入外部市场流通。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体系虽然规模有限，但具有很强的内部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4. 空间层面：社区嵌入的文化场域

传统刺绣活动深深嵌入特定的社区空间之中。绣娘们通常在家中的火塘边、院坝中或村寨的公共空间进行刺绣，刺绣活动与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和空间布局融为一体。村寨的自然环境和建筑格局为刺绣活动提供了物质空间，而节庆仪式和社区活动则为刺绣创作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社会空间。这种空间嵌入性是刺绣文化得以持续传承的重要基础。

（二）刺绣文化生态圈的当代解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传统刺绣文化生态圈遭受了系统性的解构。

1. 传承主体的流失与断裂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外出务工导致了刺绣传承主体的严重流失。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大量年轻女性选择外出打工而非留在村中学习刺绣。据调查，在贵州部分苗族村寨，能够熟练掌握传统刺绣技艺的50岁以下女性不足村中妇女总数的20%^[17]。传承链条的断裂导致许多精湛的刺绣技法和独特的图案母题面临失传的危险。

更为深层的是，传承意愿的缺失反映了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认同的弱化。在现代教育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年轻人的审美偏好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年轻女性认为刺绣是“过时的”“没有前途的”手艺，缺乏学习和传承的主动性^[18]。

2. 文化功能的弱化与替代

随着现代工业品的普及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刺绣在社区生活中的功能逐渐被替代和弱化。在服饰功能方面，廉价的工厂化服装取代了手工刺绣服饰成为日常穿戴的主流选择。在社会仪式方面，一些传统节庆活动和仪式程序被简化或废弃，对刺绣服饰的需求相应减少。在社交功能方面，手机和互联网取代了传统的面对面社交方式，妇女们聚在一起绣花聊天的场景越来越少见。

3. 生产体系的断裂与转型

传统刺绣的自给自足生产体系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遭到瓦解。一方面，传统的天然原材料（如手纺棉线、植物染料等）被工业化的化纤线和化学染料所取代，导致刺绣产品的材质品质和文化特色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为满足外部市场需求，部分地区出现了刺绣的商品化生产，但这种商品化往往伴随着工艺简化、图案模式化等问题，对传统刺绣的艺术品质和文化内涵造成了损害。

4. 文化空间的萎缩与消解

乡村社区的空心化和现代化改造导致了刺绣文化空间的急剧萎缩。大量传统村落在城镇化进程中被拆除或改造，承载刺绣文化记忆的物质空间遭到破坏。传统节庆活动的衰退使刺绣文化展示和交流的社会空间不断收缩。在一些过度旅游开发的民族村寨中，刺绣被简化为面向游客的表演项目，丧失了其原有的社区文化功能。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刺绣文化生态圈的重构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主体重塑—产业再造—空间重构—制度赋能”四维一体的刺绣文化生态圈重构路径。

（一）主体重塑：培育多层次的传承人才体系

1. 核心传承人的保护与激励

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刺绣技艺的最高水平持有者，是刺绣文化生态圈中最珍贵也是最稀缺的人力资源。应进一步完善传承人的认定、管理和扶持制度，提高传承人的经济补助标准，改善传承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传承人能够安心从事技艺传承工作。同时，应支持传承人建立个人工作室或传习所，为其开展收徒授艺、

创作研究提供空间和经费支持。

2. 乡村绣娘群体的培育与组织

绣娘是刺绣生产的主力军，也是刺绣文化在乡村社区传承发展的基础力量。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振兴要求为绣娘群体的培育提供了政策支撑。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开展系统化的刺绣技能培训。由政府主导、传承人参与，面向农村妇女开展不同层次的刺绣培训，从基础技法到高级创作，形成梯度化的培训体系。贵州省实施的“锦绣计划”即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该计划自2013年启动以来，累计培训绣娘超过50万人次，有效壮大了刺绣从业群体。二是促进绣娘的组织化发展。引导绣娘成立刺绣合作社或协会，通过集体协作降低个体经营的风险，提高市场议价能力，增强社会影响力。三是建立绣娘的职业发展通道。探索建立刺绣技艺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让绣娘的技能提升有明确的目标和激励，增强刺绣作为职业选择的吸引力。

3. 新型人才的引进与融合

刺绣文化生态圈的重构需要引入设计、营销、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新型人才。应积极吸引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具有文化情怀的社会企业家等加入刺绣文化事业。这些新型人才可以在产品设计创新、品牌策划营销、电商运营管理、文化IP开发等方面发挥专业优势，与传统传承人形成互补。同时，鼓励高校在民族地区设立实习实训基地，促进学术研究与乡村实践的对接。

4. 消费者群体的文化培育

从广义上说，消费者也是文化生态圈的重要参与者。通过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非遗体验活动等多种方式，培养城市消费者对刺绣文化的认知、兴趣和鉴赏能力，扩大刺绣文化的受众基础。当消费者不仅仅是产品的购买者，更是文化的理解者和欣赏者时，刺绣文化的市场根基才能真正稳固。

(二) 产业再造：构建全链条的刺绣文化产业体系

1. 原材料供应的本土化与优质化

刺绣原材料的品质直接影响产品的文化品位和市场价值。应鼓励和支持乡村社区恢复和发展天然纤维（如蚕丝、棉、麻）的种植养殖和手工加工，重建刺绣原材料的本土供应体系。同时，传承和恢复传统的植物染色工艺，使刺绣产品在材质和色彩上保持传统特色。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产品品质，也能为乡村社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形成刺绣产业对乡村经济的多环节带动效应。

2. 设计研发的传统与创新融合

设计是连接传统技艺与现代市场的桥梁。在保持传统刺绣核心技法和文化意蕴的基础上，应积极推动刺绣产品的设计创新。具体路径包括：一是传统图案的当代转化。提取传统刺绣图案中的核心母题和设计元素，结合现代审美趋势进行重新演绎，开发既有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产品。二是跨界融合设计。推动刺绣与时装、家居、文创、数码等领域的跨界合作，拓展刺绣的应用场景。例如，将刺绣元素融入现代服装设计，应用于家居软装饰品、文具用品、数码配件等，使刺绣从传统的民族服饰延伸到更广泛的消费场景。三是建立设计师与传承人的合作机制。鼓励专业设计师深入乡村了解传统技艺，与传承人开展联合设计项目，实现设计理念与传统工艺的有机结合。

3. 生产制作的品质管控与灵活组织

刺绣产品的生产组织方式需要在保持手工品质与实现一定规模之间寻求平衡。建议采取“核心手工+辅助机械”的弹性生产模式：核心工序坚持手工完成，以保持产品的手工价值和文化品质；辅助工序（如布料裁剪、边缘处理等）可适度引入机械辅助，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绣娘”的产业组织模式，由龙头企业负责产品设计、品牌营销和质量标准制定，合作社负责组织协调和技术指导，绣娘负责具体的刺绣制作，形成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产业链条。

4. 品牌营销的文化叙事与渠道创新

品牌建设是提升刺绣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价值溢价的关键。应围绕刺绣的文化故事、技艺特色和地域风情，打造具有独特文化辨识度的品牌形象。在营销渠道方面，应构建“线上+线下”的多元渠道体系：线上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直播带货等方式拓展全国市场；线下通过品牌专卖店、文化体验馆、旅游景点专柜等方式提升品牌形象和消费体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短视频和直播营销的巨大潜力。近年来，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刺绣类内容受到广泛关注，大量绣娘通过短视频展示刺绣过程、讲述文化故事，获得了可观的粉丝和销售转化[21]。

5. 产业链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

刺绣文化产业不应局限于产品制造和销售，还应向上下游和相关领域延伸拓展。向上游延伸，可以发展刺绣原材料种植养殖、天然染色等配套产业；向下游延伸，可以发展刺绣文化旅游、刺绣教育培训、刺绣主题展览等服务业态。横向拓展方面，可以推动刺绣与文化创意、时尚设计、数字技术、乡村旅游等领域的融合发展，形成多业态协同的文化产业集群。

（三）空间重构：重塑刺绣文化的地方性载体

1. 刺绣文化村落的整体性保护与活化

对于刺绣文化传统深厚的特色村落，应实施整体性保护策略，将传统建筑风貌、自然景观环境与刺绣文化活空间进行一体化的保护和活化。具体措施包括：保护和修缮具有文化价值的传统民居和公共建筑，使其继续作为刺绣活动的空间载体；在村落中设置刺绣传习所、展示馆、体验馆等文化设施，为刺绣文化的传承传播提供专门空间；恢复和传承与刺绣相关的传统节庆活动（如苗族“姊妹节”的刺绣服饰展示），使刺绣文化在社区仪式中保持活力。

2. 刺绣文化特色小镇的建设

在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地区，可以建设以刺绣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小镇。特色小镇应集刺绣生产、文化展示、旅游体验、教育培训、研发设计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产城融合的发展格局。湖南沙坪湘绣文化小镇即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该小镇依托湘绣产业基础，集中了数十家绣庄和上千名绣娘，同时配套建设了湘绣博物馆、游客体验中心和设计研发中心，成为集生产、旅游、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3. 城市文化空间的拓展

刺绣文化的空间重构不应局限于乡村，还应在城市中建立文化展示和消费的前沿阵地。通过在城市商业综合体、文化街区、艺术园区等场所开设刺绣品牌店、文化体验馆、主题展览等，将刺绣文化引入城市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空间。这些城市文化空间既是产品销售的渠道，也是文化传播的窗口，更是连接城市消费市场与乡村生产基地的纽带。

4. 数字文化空间的建设

在数字时代，虚拟空间日益成为文化存在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应加强刺绣文化的数字空间建设，包括：建立刺绣文化的数字博物馆和数据库，对传统刺绣作品、图案母题、技法工艺进行系统的数字化记录和展示；开发刺绣文化的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体验项目，让用户通过数字技术身临其境地感受刺绣文化的魅力；建设刺绣文化的在线社区和交流平台，为刺绣爱好者、传承人、研究者等提供跨地域的交流互动空间。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和乡村振兴理论，系统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刺绣文化生态圈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刺绣文化是一个由主体、技艺、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传统刺绣文化生态圈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遭受了系统性的解构，表现为传承主体流失、文化功能弱化、生产体系断裂和文化空间萎缩等多重危机。第二，乡村振兴战略为刺绣文化生态圈的重构提供了历史性的制度机遇。刺绣文化的复兴与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目标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契合性和协同性。刺绣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资源，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抓手，更是乡村人才振兴（特别是妇女赋权和就业增收）的有效途径。第三，刺绣文化生态圈的重构需要遵循“主体重塑—产业再造—空间重构—制度赋能”的四维一体路径。四个维度之间相互支撑、缺一不可。主体重塑提供人力基础，产业再造提供经济支撑，空间重构提供物质载体，制度赋能提供外部保障。四个维度的协同推进才能形成文化生态圈的整体重建效果。第四，刺绣文化生态圈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文化保护与经济开发、传统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政府推动与市场驱动、乡村坚守与城市拓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过度偏向任何一端都可能导致文化生态圈的失衡和不可持续。

刺绣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构刺绣文化生态圈，既是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使命，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需要。唯有以系统思维和生态视角统筹推进，才能使刺绣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中华文化复兴贡献独特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国发〔2021〕8号[A/OL]. (2021-06-11).
- [2] 苑利, 顾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十项基本原则[J]. 学习与实践, 2006(11): 118-128.
-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A]. 2018.
- [4] 贵州省妇女联合会. 贵州“锦绣计划”实施报告(2013—2021)[R]. 贵阳: 贵州省妇联, 2021.
- [5] 李怡, 吴阳芬.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 喜剧世界(下半月), 2025, (12): 100-102.
- [6] STEWARD J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30-42.
- [7] 方李莉. 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8(3): 105-113.
- [8] 刘魁立.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J]. 民间文化论坛, 2004(04): 51-54.
- [9] DFID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 London: DFID, 1999: 1-26.
- [10] 柳一桥. 智慧农业服务增强西南山区小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机理与对策探析[J]. 南方农业, 2026, 20(02): 125-128.
- [11] 韩长赋.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 中国人大, 2019, (07): 31-37.
- [12] 温铁军, 张俊娜, 邱建生, 等. 农业 1.0 到农业 4.0 的演进过程[J]. 当代农村财经, 2016, (02): 2-6.
- [13] 洪远. 浅谈传统手工艺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路径[J]. 中国民族博览, 2025, (21): 85-87.
- [14] 王庆贺, 王潇. 清水江流域苗族刺绣的多重功能与文化象征[J]. 铜仁学院学, 2023, 25(05): 55-63.
- [15] 许平山, 郝文洁, 宋莹蕊, 等. 苗族服饰文化中迁徙类纹样研究[J]. 丝绸, 2025, 62(07): 128-136.
- [16] 朱文鑫. 苗族服饰[J]. 中国国情国力, 2016, (12): 82.
- [17] 王至强, 陈海红. 苗族刺绣的传承与现状——以黔东南苗族刺绣为例[J]. 凯里学院学报, 2015, 33(02): 36-37.
- [18] 杨秀坪. 浅析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以锦屏县启蒙酸菜制作为例[J]. 中国民族博览, 2024, (15): 50-52